

臣,万没想到自己下了很大功夫扶持起来的学校最终却成了革命的地方,就连郑孝胥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公学是早存于“有心人之脑海”的计划。正如张承樵总结的那样:中国公学系由学生自行创办,先有学生,后有学校,乃教育史上未有之奇迹一也;学生自行推举人员治校,不仅开教育之创例,且彻底发挥民主自治之精神二也;办学之举,由陈天华烈士蹈海而促成;学校之存在,由姚宏业烈士跳江而持续,以生命与热血写成开创历史,令人可歌可泣三也;学校由爱国运动而起,由革命志士创办,故校内爱国革命空气,极为高涨,学校创成为革命之枢纽机关,教职员及学生则多献身革命,助成开国大业四也。^[35]中国公学对于近代中国政治的历史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注释:

①关于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的“取缔规则”,学界普遍认为该规则是日本和清政府相互勾结的产物,目的是破坏在日本的留学生革命活动。留日学生在反抗这一规则的过程中,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,是一场带有明显反帝反封建色彩的运动(参见林增平.林增平文存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.115.王开玺.取缔规则事件与革命派领导下的留日学生运动[J].北京社会科学,1995(3).实藤惠秀.中国人留学日本史[M].谭汝谦,林启彦,译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3.)。而李喜所、李来荣经过考证认为陈天华投海的主要原因是激愤于中国留学生在“取缔事件”中的盲目、蛮干、纪律差,尤其是少数人的不知自爱,借机胡来。留日学生在没有仔细研读陈天华遗书的情况下,就认为是由于他们抗议日本政府不够激烈,陈天华是以死来激励他们,于是事态影响扩大,随后发生集体归国事件(参见李喜所,李来荣.清末留日学生“取缔规则”事件再解读[J].近代史研究,2009(6).)。

②端方是清末热心学务的官僚之一。1905年底,端方出国考察时,熊希龄跟随端方任参赞,回国后不久出任两江总督,以其在欧洲见闻积极施行新政,热心留学事务,经努力获得耶鲁大学每年捐赠学额11名,千尼路大学赠6名,维斯里大学赠3名女大学生名额,均免收学费(参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.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政治军事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.63.)。此外,端方与袁世凯、张之洞等极力主张停科举、广兴学堂。端方任两江总督

期间,大力兴办小学堂、创办女子学堂、高等学堂、实业学堂,推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(参见沈云龙.端忠敏公奏稿卷八[A].沈云龙.近代中国史料丛刊(第十辑)[C].台北:文海出版社,1966.)。

③后据报纸上评价:健行公学以教育坛场而提倡革命,上承爱国学社之余绪,下开上海大学之先声,不可谓非革命历史上一纪之物也(资料来源:发起健行公学校友会启事[J].申报,1936-02-22.)。

④1905年,同盟会在东京成立,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草案。章程根据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,规定同盟会由相互独立的执行部、评议部和司法部组成,其中执行部中设庶务、内务、外务、书记、会计和调查六个部门,由总理节制。当时,同盟会成员多为留日学生,取缔事件发生后,许多同盟会的成员也回国了,并参与了中国公学早期的筹划工作,同盟会的体制也就随着应用到了中国公学的建制上了。

⑤王敬芳在解释中国公学修改校章时说,当时共和制度所以修改,有三个原因:第一个原因是日本取缔规则风潮结果,原发起公学的留日学生有一部分仍回日本。公学成立后不久,即有同发起公学的朋友朱君少屏等,因意见不合,率领一部分江苏学生退出公学,另办健行公学。因此原发起时的学生日少,而各省新考入的学生日益加多。学生内部的情况,与初发起时完全不同。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政治上及社会上的人,均不以公学共和制度为然。曾记一日赴郑苏戡先生处,时报馆的狄楚卿君在坐,极言公学学生主体之不可。途时我为拥护公学计,侃侃与之辩驳。狄君行后,郑颇怪余言太憨直。当时社会对公学之批评,可见一斑。第三个原因是当时工学既无校舍,又无基金。除初办时郑苏戡先生曾捐开办费一千元(或二千元),姚烈士遗书宣布后南洋华侨胡子春、林某(忘其名)等激于义愤,次第捐洋数千元(或万余元)外,丙午年内实无各省官款分文之补助。经济困难,岌岌可危。故欲求公学存在,非向各省请求补助不可。公学之共和制度,既为政界及社会所诟病,若不修改,必为筹款最大障碍。根据以上三个理由,乃延请郑苏戡、张季直、熊秉三等数十人为董事,修改章程,而学生主体的学校遂变为董事会主体的学校。董事会根据新章公举郑苏戡为监督。一年后,郑君辞职,董事会又举夏剑丞敬观为监督,至辛亥鼎革始解职(资料来源:王敬芳致胡适函[M].庄建平.近代史资料文库(第9卷)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9.208—209.)。